

哈尔滨工程大学
社会学丛书

华商淘金莫斯科

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

Chinese Businessmen in
Moscow:

The Survival Behavior of
a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Group

于 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哈尔滨工程大学

社会学丛书

华商淘金莫斯科

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

Chinese Businessmen in
Moscow:
The Survival Behavior of
a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Group

于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商淘金莫斯科：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 /

于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丛书)

ISBN 978-7-5097-8477-8

I. ①华… II. ①于… III. ①华人—社会生活—
研究—俄罗斯 IV. ①D634.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4692 号

·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丛书 ·

华商淘金莫斯科

——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

著 者 / 于 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孙 瑜

责任编辑 / 孙 瑜 杜 敏 刘德顺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36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477-8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于涛在《华商淘金莫斯科：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一书付梓之际，请我为书作序，我深感义不容辞。

于涛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就职于哈尔滨工程大学，2010年考取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以后，根据他原有的学业背景（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且他有较好的俄语基础，决定让他发挥自己的优势，做一个与俄罗斯有关的社会学研究。于是，在2011年我申请到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被排斥境遇下的移民适应研究——基于俄罗斯中国移民的实地调查”（课题编号1112KYXJ04），作为我们共同研究的课题，并资助他到俄罗斯做田野调查，2012年选派于涛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在莫斯科，他一边学习一边做田野调查，历时8个多月。

到过俄罗斯的人都知道，莫斯科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太好，那里的华商在当地的生存环境也异常的恶劣。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学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深入当地华商群体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取得当地华商的信任，从日常生活入手，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探究他们的生存策略，获得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实属不易！

2013年于涛以“莫斯科华商：一个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行动”为题，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并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且被答辩委员一致肯定为一部俄罗斯华人研究少有的力作。2014年笔者再次深入到莫斯科华商群体中，继续做追踪调查，在原来的博士论

文基础上补充和完善，完成了《华商淘金莫斯科》这部著作。可喜可贺！

中国向俄罗斯的人口迁移历史比较久远。早在 17 世纪，沙皇俄国就已同当时的中国明朝开始贸易往来。而两国的民间交往，尤其是边境居民，一直没有间断，即使在 20 世纪早期和中叶中苏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交往也没有中断过。这主要是因为中俄两国拥有全世界最长的陆地边界线，历史上形成了多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当代，去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以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最多，他们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和双边关系的不断升温，前往俄罗斯的“倒爷”不断涌入俄罗斯。他们最开始主要在远东、西伯利亚，后来莫斯科郊区的“大市场”成为最集中的地区，逐渐形成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在俄华商群体。到如今，这部分华商群体在莫斯科打拼已有 20 多年。华商群体是中俄关系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对于这部分群体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的研究都鲜有涉及。俄罗斯媒体有一些报道，大多充斥着“中国移民威胁论”等负面的看法和排斥心态。国内学者对这部分群体关注也很少，以这部分群体为研究对象做社会学研究的更是未见。于涛无疑为此领域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该书中，笔者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理论探讨莫斯科华商的生存策略，重点关注华商如何利用自身社会关系资源从事商业活动，进而深入探究作为迁移主体的在俄华商如何利用其社会外在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构建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在研究中，笔者借鉴海外华人研究中前沿理论“跨国主义”分析框架，从“跨国性”角度总结了这一群体的特征，采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即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获取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围绕华商如何淘金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研究还结合了一些有关早期华商的历史文献材料，主要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

化前后的历史文献、华人的回忆录及相关华人的报刊和当时的新闻报道等，这些材料对了解华商的历史和早期状况极为重要。海外华人的“跨国主义”研究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它同民族—国家视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笔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尝试性探索。

于涛还很年轻，这是他的首部著作，我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而高兴。愿他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不断进步，硕果累累。谨以此为序。

任国英

2016年2月20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导言	001
第一节 迁移与生存	001
第二节 本研究的特点	004
第二章 理论与方法：从行动者的视角	007
第一节 社会行动与行动者	007
第二节 从日常出发的行动研究	016
第三节 本书的写法与结构	020
第三章 华商形成的历史背景	023
第一节 接纳的背景	026
第二节 出国的背景	034
第四章 进入与坚持	042
第一节 早期“倒爷”	043
第二节 经营场所变迁	053
第三节 当前华商的新情况	057
第四节 徘徊与坚守	062
第五章 经济活动	067
第一节 淘金场所	067

第二节 市场经营	078
第三节 跨国直销	102
第六章 移民网络与淘金资本	106
第一节 迁移中的移民网络运用	109
第二节 作为淘金资本的乡土关系资源	118
第三节 关系资源的不同运用：两个个案的比较	135
第七章 族际互动与融入	142
第一节 淘金场中的族际互动	143
第二节 华商在当地的融入	158
第八章 跨国生存	178
第一节 华商的跨国性	179
第二节 跨国生存空间构建：一个典型个案	186
结 语	192
参考文献	202
附录一 被访者简要生活史	213
附录二 研究过程与田野经历	235
致 谢	271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迁移与生存

人类自产生以来，为了生存就不断地从一个地域迁移到另一地域。人类的祖先最早出现在非洲，后来才逐渐散居到地球其他区域中。根据美国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 Diamond）的研究，人的历史与动物的历史分道扬镳，是大约 700 万年前开始于非洲。在大约 700 万年前起源后的最初 500 万年或 600 万年中，人类的活动仍然局限于非洲。早期移民潮是在约 100 万年之前从非洲大陆迁移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50 万年前迁移到北欧。约 5 万年前，人类才踏上澳洲大陆及南太平洋岛屿，2 万年前到达西伯利亚，北美洲和南美洲是在 1 万年前左右才有人身影（戴蒙德，2006：3 - 23）。每一次人口迁移，都意味着人类发现和进入一个新的生存空间，显示着其生存状况发生的新变化。可以说，人类的迁移进程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生存方式并促进了社会文明发展，当今社会各种文化、语言、种族和民族的形成，都同移民有着重要的关系。

随着 15 世纪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人口迁移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一般认为，从 15 世纪以来，国际人口迁移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始于 15 世纪末终于 19 世纪初，这主要源于新航路的开辟，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向全球扩张，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众多的殖民地并不断向殖民地进行人口扩张。第二次是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国际移民浪潮继续进行，规模进一步扩大，移民的规模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共有 5000 万以上的人口从欧洲移居美国、加拿大和南美洲。第三次是“二战”后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国际移民浪潮。前两次迁移基本上是由宗主国向殖民地迁移，由旧大陆（亚非欧三大洲）向新大陆（美洲和澳洲）迁移，第三次国际人口迁移浪潮则是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迁移（佟新，2000）。二战结束初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高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人口大量向发达国家迁移。而进入 21 世纪，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人口迁移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国际的人口迁移规模越来越庞大，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涉及的层面也不断扩大，跨国流动愈加频繁。根据联合国经济与事务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字，全球跨国移民总数从 1990 年的 1.54 亿上升到 2010 年的 2.14 亿，并预计在 2050 年将达至 4.05 亿（转引自李明欢，2011）。因此，当今时代被认为是移民的时代，国际人口迁移是 21 世纪的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基于此，联合国在 2009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跨越障碍：人员流动与发展》中把迁移和人口流动作为主题，认为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寻找更好机会，是当代国际移民的基本要求，并把能否实现自由迁移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历史悠久，海外迁移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从商周至近代 3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因为各种原因迁居到今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地区（葛剑雄，1997）。特别是在东南沿海的闽粤地区，自唐代以来一直与东南亚地区保持着紧密联系，并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最重要区域。但大规模地向海外人口迁移则始于近代，由于西方殖民化引起的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进而带来的全球移民浪潮，中国移民以主动或被迫的方式卷入其中。进入 19 世纪，当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后，殖民者就把目光转移到中国丰富的

人力资源上。近代西方殖民者在开辟了一些新的殖民地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从非洲贩卖奴隶的贸易被禁止后，劳动力来源被阻断，进而西方国家把中国作为获取劳动力的主要源头。而清末时国内的人口过剩，使得很多中国人也向外寻找生存机会，“契约劳工”“华工出国”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海外迁移的主要形式（范玉春，2005）。此时不仅在临近中国东南沿海的东南亚地区有大量的华工，在遥远的美洲、非洲乃至大洋洲，也都有大量华工出现。华工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排华的影响，很多人被迫回国，但也有少数人最后留了下来。当今华人移民在世界的广泛分布，同近代“华工出国”有着紧密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在国内不仅禁止人口的自由流动，更不允许和国外有任何的往来，基本阻塞了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改革开放后，随着相关政策的改变，被抑制的人口迁移动力极大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国内，农村人口为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大量迁移到城市，形成“民工潮”。与此同时，又掀起了一股向海外人口迁移的浪潮。国人或者去海外投奔亲属，或者去海外留学，或者去海外投资经商与打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向海外的迁移群体，又被称作“中国新移民”^①，其数量和规模也已相当可观。新移民同老移民相比，分布范围更为广泛。除了传统的华人移民聚集地外，欧洲地区又成为一个新的迁移区域，在一些新兴国家和非洲地区也出现大量中国人的身影；移民目的更加多样化，以探亲、留学、务工、经商等不同目的进入迁移国；移民形式也并非仅仅是“落叶生根”或“落地生根”，出现了一些经常性地在两国间进行跨国迁移与流动的华人群体，国籍和移民身份对这些人仅仅是为了生存发展的便利和需要。总之，在当今的

① 关于中国新移民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庄国土教授认为，中国新移民应该是指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不仅包括大陆也包括海外的华人移民；华人华侨研究所的张秀明研究员则认为新移民是指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后一种界定是当前学术界的主要观点。

时代条件下，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 本研究的特点

伴随着中国向海外的人口迁移和逐步适应融入当地社会，海外华人已成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海外华人研究也已成为一个较为特殊和重要的领域，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对此都有所涉猎。从这一领域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更多考察的还是华人较早进入的美国和东南亚地区。而近年来在欧洲地区的华人新移民开始迅猛增多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相应的研究和讨论还未充分展开。

在欧洲华人群体中，俄罗斯的华人人数众多并较有特色，但其研究在海外华人领域却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地位，特别对俄罗斯当代的华人问题鲜有涉及，更少有社会学、人类学实地考察式的研究。本书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商务活动的个体华商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这一群体进行实地考察和探究。他们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苏关系正常化后陆续来到莫斯科的，又被称作“中国倒爷”。早期主要是通过手拎肩扛从国内带来一些商品，高价出售给当地人后再返回国内的方式来从事商业活动的。后来随着中俄贸易方式的不断变化，专业物流公司相继成立，在当地也寻找到固定经营场所，华商群体才逐渐稳定下来。同已经见诸学术研究的海外华人相比，这一群体有着极为鲜明的特征。

第一，华商来到莫斯科的历史较短，人员并不稳定。从首批华商来到莫斯科至今，仅仅二十几年的时间。而不稳定的淘金环境使得他们的流动性很大，一些华商回国了，国内又有新的人员加入。人数也起起伏伏，时增时减。美国、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有百年以上历史，在移居地较好地解决了生存问题，他们的后代逐步地适应和融入了当地社会。当在这些国家已经产生了第四代、

第五代华人时，华商在莫斯科的第二代才现雏形。而对大部分华商来说，他们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经商赚钱，大部分人还是表现出“落叶归根”的心理状态，最终还是要回国的。因此，华商在当地的文化适应和融入问题并不十分突出。

第二，华商在莫斯科并未形成自己的“唐人街”。具有族裔经济聚集区功能的唐人街是其他一些国家早期华人生存和融入的主要模式，如周敏认为纽约唐人街的出现，是美国西海岸反华运动和排华法案直接产生的后果。在排外的影响下华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聚集区的经济体系，即“唐人街”。在“唐人街”中，虽然也有针对外族市场的行业，但这是附属，最主要的是有自己独有的金融市场、劳务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保障，明确以民族消费市场为目标（周敏，1995）。华人在俄罗斯所处阶段同美国早期华人的所处阶段极为相似：俄罗斯民族较为排外，又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对外来移民限制较严，华人很难取得当地的移民身份，也很少有人从事当地的职业。在此情况下，华人有可能形成一个如唐人街的聚集区。但在俄罗斯，法律却严格禁止建立“唐人街”，也不允许华人集中聚集在某一区域，因此大部分华商只能在当地的市场中经营中国较有优势的轻工业品，而这种经商场所则是多国商人共同聚集的地方，商品的销售对象更多面向非华人。

第三，从华商的群体特征来看，这部分人本质上是一批跨国淘金者，是一批跨国倒买倒卖中国商品的生意人。中国商人走进俄罗斯，实质上就是把廉价的中国商品带入其中的过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内产生了大量的剩余轻工业品，而转轨后的俄罗斯生产大幅下滑，迫切需要价格低廉的日用品。中国商人利用了经济上的这种比较优势，把对方急需的各种商品带入到莫斯科，在当地市场进行销售；同时把国内家乡作为根据地，为其提供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支撑，他们就主要通过这种不断跨越边界的活动在当地淘金赚钱。

以上三个特征使得俄罗斯华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华人群体。那么，作为跨国淘金者的华商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当前俄罗斯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不稳定，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淘金，在获得高利润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高风险。警察的盘查和勒索，货物经常被没收，光头党的袭击，不法分子的抢劫等。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华商是怎样应对的？他们又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从而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每位在莫斯科能够生存下来的华商都有着曲折的经历，他们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在当地立足，在这些不同的经历中一定有着共同的东西，这种能够支撑他们在高风险环境中生存适应下来的共性是什么？笔者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进入这一群体，参与他们的日常活动，获取第一手资料。在研究过程中，更注重从行动者主体的视角出发，深入华商群体的生活世界来探究其在当地的淘金境遇以及如何运用自身的行动能力更好适应外在生存环境的问题。笔者期望通过这样的调查和分析，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一群体，消除误解^①；同时也希望能为俄罗斯华人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等宏观问题的探讨提供参考，这即是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过程。

① 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对俄罗斯华人关注得不够，了解得不多，在国内主流媒体中很少能见到相关报道。而在俄罗斯则对这部分群体较为关注，但在宣传中却经常夸大华人群体中少数人的不良行为，出现一些负面新闻和报道，如认为中国商人大部分都是非法移民，不遵守当地法律，行贿官员等，甚至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华人是影响中俄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这些误解都是因为对这部分群体了解不够造成的。

第二章 理论与方法：从行动者的视角

社会学虽有着众多纷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但一般都可归纳入以社会、结构为分析视角和以个体、行动为研究视角的两大范式中。两种流派主要围绕着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哪方面起决定作用等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论争，同时在方法论上也表现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不同范式。在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中，从社会 and 结构入手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大部分社会学研究中个体、行动者则是被动地受制于社会、结构，而真正能体现行动者主体地位作用的研究则较为缺乏。

本书主要是以社会行动视角，从行动者主体的角度来涉入的一种研究，期望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求个人、行动者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视野中的合适地位，并最终能够对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社会学相关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因此，本书的理论视角主要借鉴社会学中关于社会行动与行动者的相关分析，方法上也偏重于能真正进入行动者日常生活的质性方法视角。

第一节 社会行动与行动者

社会学产生之初，“社会”的地位就被推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如早期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人把社会看作高于个体的实在，他们把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认为由

个人组成的社会整体同细胞组成的生命有机整体相似，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整体往往表现为不同于并高于个体的属性。这种思想在迪尔凯姆那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提出了要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考察，并认为这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社会现象即他所定义的“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迪尔凯姆，2011：25）。迪尔凯姆甚至还提出社会事实只能由社会事实来解释的社会学整体主义研究方法路径：“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迪尔凯姆，2011：25，122）社会学解释不仅无须借助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解释，相反，必须把任何基于个体层次的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解释排除在外。

由迪尔凯姆开创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成为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大视角，这就是要从社会入手，用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去解释和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体，这也被之后大部分社会学理论流派所接受。整体主义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主张将研究领域定位在社会层次，如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现象等宏观层面，用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去解释和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体。在这种视角分析中，个人经常是不为人知的无形的，被无情地贬低到一个特定类别和特定群体中，他们只能被动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被动地受制于社会 and 结构。这种思路发挥到极致时，就会成为社会和结构决定论，个体的能动性淹没到各种社会结构中。

从个体及行动视角来进行研究的社会学进路则捕捉到整体主义方法论所造成的个体被决定的问题，其研究从社会行动切入，探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问题。以下将重点关注和本书密切相关的社会行动研究的几大理论视角。

一 动机、意义与社会行动

最早把社会行动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是马克斯·韦伯。

韦伯认为“社会唯实论”中所认为的真实社会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仅仅是个体。因此，只有从个体出发，对社会行动进行研究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韦伯，2005：13）。所谓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社会行动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他人的行为。就韦伯的观点来说，这个主观意义必须从人的动机上来捕捉。当然，这所谓的动机是不同于个体心理层次的另一种理解。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体验行动者赋予行动者的意义来进行解释性理解，并运用理想型概念工具进行因果性说明。因此，韦伯提出“移情法”或“主观内省法”对赋予主观意义的行动进行研究。必须要指出，韦伯对社会行动分析的重点并不是要去分析行动者真正的主观意义，他所强调的重点是通过行动发生（也是动机引发）的时空情境特质，来掌握行动者意向背后所可能具有之共同且分享的文化“意义结构”（叶启政，2004）。

帕森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赋予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即他认为外在社会作用于个人，行动者主体是认同社会价值观念的赋予意义的过程的。也就是说，行动者是主动地、意志自愿地而非被动地接受社会价值规范，并将其作为社会行动的动机和意义。在这样的行动的概念上，帕森斯重点针对单位行动进行分析。每个行动单元包括行动者、目标、情境和规范取向四个部分，但行动始终是由规范来确定方向的。帕森斯后期开始创立其宏观的社会理论，即结构功能主义。而其理论更加强调的是结构的稳定和功能的问题，个体行动往往是受制于结构制约，而结构的变迁也必然是在系统中进行，这种强调结构的系统和功能的宏观理论，自然没有行动者主体的地位（帕森斯，2003）。

真正延续韦伯动机与意义式社会行动理论的是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舒茨也认同韦伯认为的应把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对